

张大千家书

包立民
编著



张大千家书

包立民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张大千家书 / 包立民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13-778-8

I. 张… II. 包… III. 张大千—书信集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2261 号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6.375 印张 135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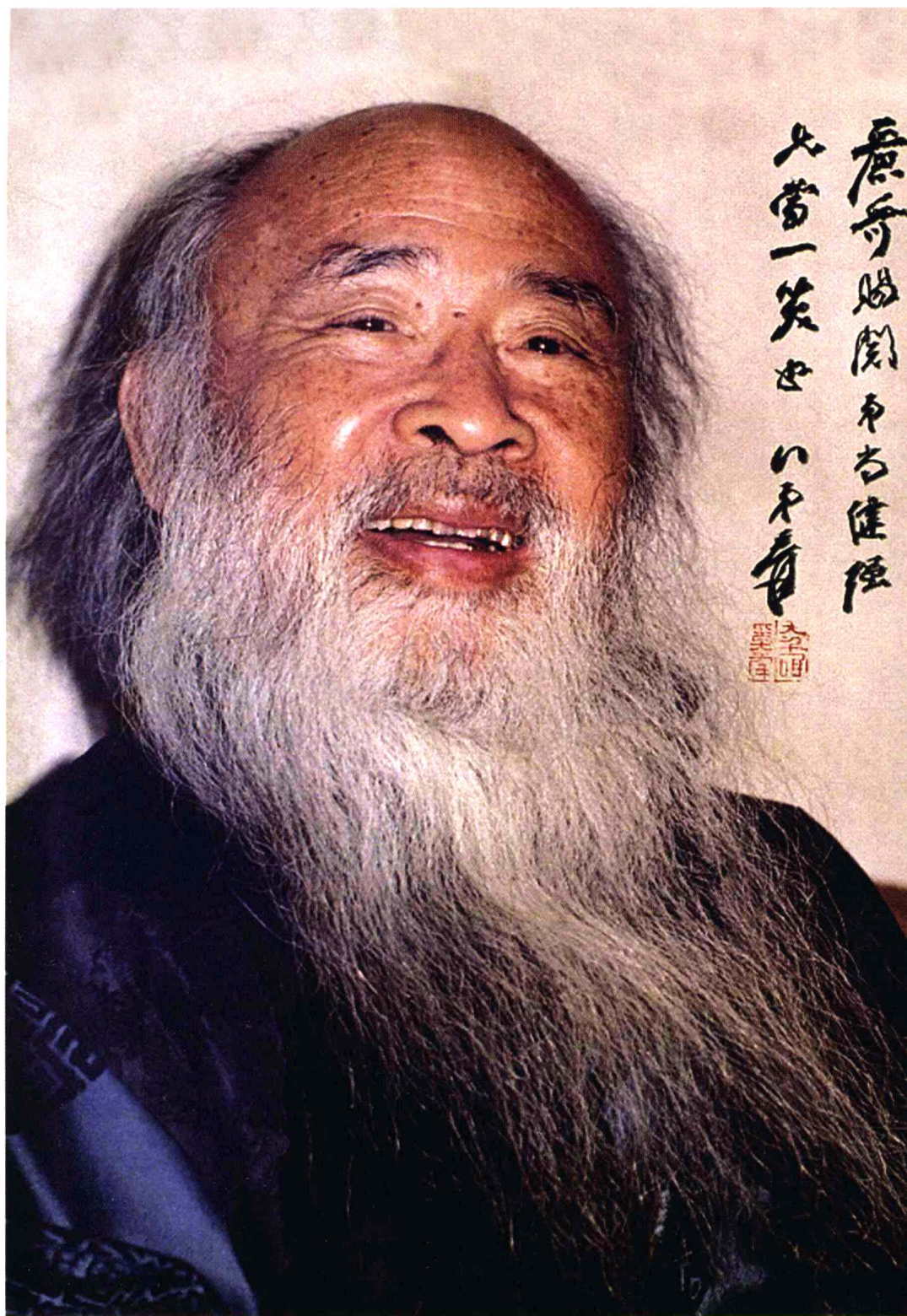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唐奇始創方丈健強
大當一笑也 八十八





目 录

1	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	包立民
27	1961年1月23日	
35	1961年2月19日	
43	1961年5月29日	
54	1961年6月12日	
61	1961年8月22日	
69	1961年9月20日	
80	1961年11月13日	
86	1962年1月9日	
96	1962年2月9日	
103	1963年3月4日	
109	1963年4月22日	
114	1963年8月25日	
123	1964年1月21日	
132	约1967年	
140	约1967年	

153	1968年4月8日
158	1969年6月7日
163	约1971年
167	1972年1月17日
178	1974年
184	附信(1957?)
193	张大千家族简介
195	跋
197	编后记



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

包立民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已着手搜集与研究张大千的轶闻与艺术生涯，并分批将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发表，历八年之久，编辑成《张大千艺术圈》一书，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段章节，即《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一直想写，却又迟迟未写。未写的原因主要是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张大千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涉及如何看待张大千的爱国与否。由于这是一个比较复杂微妙而又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采取了暂时回避、再思索的态度。

1996 年从友人寄来的一篇署名黄壤的文章《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中，读到一段抗战胜利后，张大千与张群对国共两党前途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二张赤裸裸地大谈军政要事，张群还以“狡兔三窟”之计，为国民党撤退后精心安排了自己与张大千迁居巴西的退路。（见《中华收藏》1995 年 23 期及《收藏》1996 年 10 期。）这篇奇文采用“假言村语”的笔法写出了“二张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心态，也赤裸裸地触及张大千在去国前的反共态度”。据作者黄壤披露：“此文虽用‘假言村

语’敷衍，然而却没有将真事隐去，但告诉我内幕的老先生（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皆是著名人士，其中有一位最近已去世）的姓名，由于其不愿暴露自己的身分，我不得不隐去。”

《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一文发表后，激怒了张氏子女和大风堂学生，指责黄壤伪造历史，诬陷张大千，有的还请了律师，准备状告黄壤，对簿公堂。黄壤是谁？黄壤者，黄郎也。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将真名隐去的一个假名。真名、假名无关紧要；笔墨文章涉及是非曲直，要对簿公堂，也大可不必。艺术圈内外，惯于造谣、欺世之伎俩，可谓屡见不鲜。但不能见怪不怪，置若罔闻。何况，究竟是谁“欺骗了大千世界”，乃是一个不可不辨的大问题。黄壤文中的奇谈怪论，倒是又一次引起我的思考：张大千为什么离乡去国？为什么迟迟不归大陆，而要到台湾？张大千是不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画家？思之再三，促成了我这篇文章。

“二张”奇谈质疑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的这篇文章是因黄壤的“二张”奇谈催化而成的，而这段奇谈确实又是鲜为人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秘闻”，所以有必要抄录于下，供读者“同赏”。

张群问张大千：“您看这次国内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谁胜谁败？”

张大千说：“还用问吗？共产党不过是几个土匪，何堪一

击呢？”

张群叹了一口气：“您毕竟是一个画家，军政大事，您不了解啊。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也断言，一年内消灭共产党，半年内消灭共产党，有人更叫喊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其实谈何容易啊！这场战争十有八九是国民党败。”

大千听后吃了一惊，反问张群：“何出此言？”张群因深知内情，于是便向张大千作了详尽的分析。

张群说得老泪纵横，不停地叹气，张大千听后，觉得颇有道理。

张群叹道：“您是画家，不论哪党当政，您靠自己的画吃饭，我张群就不行了。国民党当政，我吃得很好，国民党败了，我张群就无安身之地。唉……”

张大千一拍胸脯说：“这个您放心，我张大千有饭吃，就有您的饭吃。”

张群摇摇头。他深知这个行政院长，拖家带眷，一掷千金，靠画家卖画养他，就太寒碜了。他又深知张大千是讲义气、重朋友之托的可靠人，因而，他要张大千配合他安排后退之路。

张群告诉大千：“如果国民党胜了，一切都不成问题；如果国民党败了，那我们就要先找一个安身之处。大千，我今天找您，就要您帮我办这个事。”大千一听，又是一愣。张群又告诉大千：“狡兔三窟。可我现在忙于政务，没有时间去经营，我在巴西有朋友，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地或经商，但巴西政府对在巴西投资太多的人，要查清其财产来源，财产来源不清的，或者不准经营，或者没收其

经营财产。即使巴西政府不问，这批钱也要有来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不久，张大千果然依嘱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张群也果然带领他的部下光临，其中多数是川籍的军政人员。他们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番张大千的画，接着便纷纷贴红纸条购买，而且为了抢购，竟出高价……于是舆论哗然，消息不胫而走。

……本来一个普通画家，一日之间，变成了与齐白石齐名的大画家，其名气传播之远之广，自然超过了齐白石……

以上所引的“两张”谈话，谈在何时何地？黄壤没有交代。传自何人之口？黄壤说，故隐其名。但是细细分辨谈话内容乃至用语口气，就会发现，这段话编得并不高明，破绽百出。兹质疑如下。

其一，从当时“二张”的地位身分和交情关系上，不可能大谈国共两党谁胜谁负的重大问题。关于“二张”之交，拙著《张大千艺术圈》中，曾有专章论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大千就已结识了张群，当时张群的身分是上海市长，而张大千只是客居上海的一介画家。当时他俩的交往是“二人同嗜石涛八大书画，每有所得，辄相夸示”。30年代张群藏有石涛通景屏风，60年代张大千还为其影印出版写序。据北京画家，大风堂早期弟子刘力上回忆，当时他刚拜师，住在大千先生家里学画，他还遵师之命，到张群家里送去过书画（很可能是他俩“每有所得，辄相夸示”的石涛、八大书画）。又据刘力上告知，40年代“二张”在成都交往很少，他也偶有所闻，主要是艺术上的交往。大千先生从不谈政治，从当时的身分地位和交情关系上，他绝不可能

延華拱五子夫子大祝公會分設上海門同堂



1948年5月上海大风堂同门会祝张大千五十寿辰，前排左五起李祖韩、张大千、徐雯波、杨浣青、顾青瑶、李秋君。

与张群大谈军政要事。为了证明刘力上的判断，可以引用张大千逝世后，张群在回忆大千居士时说的一段话来证明：“大千与我最初相识于上海，抗战时期又在四川，当时我的先后职位是上海市长和四川省主席，大千不太喜欢接近官员，我们相处熟而不亲。那一时期，我所得的大千书画，都是购买的。”（见黄肇珩：《画德、画才、千古一大千》，转引林建同编著的《大千璀璨录》。）试想，一介不问政治的书画家怎可能与“熟而不亲”的四川省主席大谈国共两党的命运前途呢？

其二，黄文中谈及张群找张大千商量“狡兔三窟”，安排巴西退路之事，这更是子虚乌有不可能。按黄文所言，张大千迁居巴西，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有张群安排好了。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众所周知，张大千从香港迁居南美洲，时间是1952年8月。但是第一站是阿根廷，而不是巴西。在阿根廷侨居一年后，才迁往巴西。如果数年前张群早有安排的话，何以又要多此阿根廷一举呢？至于张大千何以又要从阿根廷迁居巴西，据张大千自述：“我在阿根廷侨居期间，曾赴美国旅行，来回都要经过巴西，会见侨居在巴西圣保罗的朋友，知道他们在那儿办农场养鸡，都颇能安居乐业，巴西的人情味，远比阿根廷好，在巴西的朋友都劝我搬到巴西来，因为巴西欢迎移民，居住权的问题也好解决。”（见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又据张大千的香港老友朱省斋在《记大风堂主人》中说，是“因受人骗，损失不少，遂又迁到巴西”。不管是为了居住权，还是因为在阿根廷受人骗，总之他是由阿根廷迁居巴西的，而不是张群早有安排的。

其三，黄文说，张群为了安排退路，让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画展，他在幕后指挥川籍部下抬价抢购张氏展品，变相筹款。这件事说得绘声

绘色，有鼻子有眼，实际上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据李永翘在《张大千年谱》（四川美术出版社）中记载：1945—1949年，张大千在成都先后举办过两次画展，第一次是在1945年10月中下旬，第二次是在1947年10月。两次画展中，第一次确有轰动效应，全部展品在数日内也的确被定购一空，张群也参加了这次展览活动，并且为其中一幅展品——临安西榆林窟的《水月观音像》——平定风波。“达官显贵，古董商人，字画收藏家们争出巨金购买，相持不下，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排解无效，只好请示省政府主席张群定夺。最后由张群决定，该画由新都县买下，放置在宝光寺内，这场争画风波才告平息。”（见《张大千年谱》转引自修文：《张大千的水月观音像》）如果黄壤所说的张群授意张大千筹款举办画展，就是这次画展的话，那末可以推定他所说的“二张”谈话时间是在1945年10月下旬。

倘若推定时间不错的话，那末可以断定张大千不可能将这批画展款储存起来。何以见得？首先，存钱不符合张大千的个性习惯，他从来是一手钱尚未进来，另一手钱就已出去了。也就是说他往往先借后还，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超前消费。其次，当时他正急需用钱，有钱也存不住。因为1946年初（也就是两个月后），他就携钱从成都飞到北平，以数百两黄金的巨资，买下了董源的《江堤晚景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历代名迹，为了买下这批名迹，他不仅花完了从成都带去的所有资金，还向朋友借贷（据他的学生曹大铁说：仅从他处就商调了一千万元，约合一百一十两黄金）。这次成都画展卖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怎么也不够他这次北平之行所需。可见黄文所说的，张大千把这次卖画所得存到迁居巴西才动用，纯属编造。



张大千的山水画。

其实，张大千去国前卖画所得最多的画展，不是在成都，而是在上海。不过，去定购展品的都是李祖韩、李秋君兄妹邀请的一批银行家、收藏家，而不是张群手下的“川籍官员”。卖画所得，除了归还旧账，又去北平以五十条金子的巨资，买下了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的《潇湘图》两幅稀世珍品。试问张大千如此这般“挥土如金”地购买历代名画，哪里还有钱储存下来呢？

1952年张大千从香港迁居南美洲的旅资从何而来？众所周知，当年他是忍痛出让了两幅稀世珍品（即《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及一部宋人册页才卖得两万美金。

从以上三点来看，黄壤在《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一文中，记述的张群与张大千的一场谈话，实在可疑。这场谈话黄壤从何人口中采集到的，有没有录音与笔录的旁证，还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笔者以为，不管是属于哪一种，“二张”的这场谈话，怕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而成的。

本文的主题是写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因此黄壤文中涉及张大千人品、艺品等另一些问题，不再一一辩答，以免喧宾夺主。

张大千为什么去国

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

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因此严格来说，他的去国之日，应该从他最后一次离乡之时算起（据李永翘在《张大千年谱》中考证，他从成都搭飞机赴台湾之日是1949年12月6日）。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所以既不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亲近。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做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我问刘力上，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刘力上回道，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不信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谈到这里，刘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大千先生亲口对他谈起此事，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老师，咱们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踌躇片刻说：“你老师一走，师母、师弟、师妹们郎格办？王灵官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的军阀王陵基